

统一战线·华侨华人

# 华侨华人与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 逻辑理路与政策意义

陈奕平，曹锦洲

[摘要]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门户，在全国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而华侨华人是粤港澳大湾区对外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鉴于二者间的密切联系，华侨华人与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可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研究的新课题。新时代华侨华人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的逻辑进路在于，华侨华人结合自身的资源优势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通过多种平台和机制，从经济、科创和文化等多个维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对外开放。华侨华人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的动因可以归结为两方面，一方面在于他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切期盼，另一方面在于粤港澳大湾区为华侨华人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结构性机会。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粤港澳大湾区应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汇聚全球侨胞力量共建世界一流湾区，同时为华侨华人在大湾区实现理想抱负提供更广阔的政策空间。

[关键词] 华侨华人；粤港澳大湾区；逻辑理路；政策意义

[中图分类号] D6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072(2026)01-0027-18

DOI: 10.11778/j.jnxb.20231741

## 一、研究缘起与学术综述：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研究的新课题

2025年1月，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政府迅速回归“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路线，通过推进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持续削弱了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

作者简介：陈奕平，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曹锦洲，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25&ZD211)。

基础,进而推动逆全球化浪潮加速蔓延。<sup>①</sup>在全球治理失序、制度摩擦频发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背景下,以社会网络与身份认同为基础的跨国移民网络,日益成为维系祖(籍)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经贸、科技与文化交往中不可忽视的通道。作为历史悠久的跨国族群,华侨华人群体长期活跃于全球经济体系,不仅在资本、技术与人才等方面具备显著的资源禀赋,更因其跨国身份特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充当着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通道”。<sup>②</sup>当前,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与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新形势下,如何利用华侨华人联通中外的桥梁纽带优势,助力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亟须探讨的重要论题。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中国推动建设全面开放新格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举措,其在新时代背景下与华侨华人有着密切互动。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应“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携手港澳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特别要求增进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人文交流。<sup>③</sup>可见,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的关键窗口,同时,作为大湾区对外交流的重要纽带,华侨华人有望在大湾区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的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在此背景下,以华侨华人在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中的参与实践为切入点,厘清华侨华人在新形势下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功能定位,有助于探讨中国利用华侨华人的桥梁纽带优势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路径与机制,同时也为深入理解国际移民与祖(籍)国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2017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发表的《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正式将粤港澳大湾区纳入顶层设计。<sup>④</sup>此后,粤港澳大湾区相关话题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当前,学界有关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多以地理学、经济学的学科视角对其进行探讨,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聚焦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属性特征,通过与国际湾区的横向比较,分析大湾区发展的特殊优势与主要障碍。相关文献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承载着粤港澳区域合作发展、“一带一路”倡议重要支点与“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等多重国家战略功能。<sup>⑤</sup>粤港澳大湾区得以形成的关键在于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强大的空间联系为大湾区内生产要素的流动创造了条件。<sup>⑥</sup>然而,相较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等知

① 屠新泉、田家琪、李建桐 《特朗普第二任期贸易政策震荡、全球影响和中国应对》,载《亚太经济》2025年第2期。

② [美]孔飞力著,李明欢译 《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94页。

③ 中共中央、国务院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2页。

④ 李克强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9页。

⑤ 蔡赤萌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挑战》,载《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⑥ Hui, E. C. M., Li, X., Chen, T., et al., “Deciphering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China’s Megacity Region: A New Bay Area—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the Making”, *Cities*, Vol. 105, 2020, pp. 1–15.

名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在原始创新能力、协同创新能力与内部科创规则对接方面仍存有一定差距。<sup>①</sup>二是从粤港澳三地合作发展的角度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形成的历史。相关研究指出,以往的珠三角地区依托内地的资源密集型、低附加值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以及香港的国际市场和人力资本,形成了港澳接单、管理、出口和珠三角制造的“前店后厂”模式并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sup>②</sup>然而,随着劳动力和土地的价格上涨、环保政策法规的趋严以及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珠三角地区面临着严重的发展瓶颈。<sup>③</sup>在此背景下,从原有的“前店后厂”模式转型为“中国湾区”模式,打造以高科技工业体系为驱动、生产要素高效流动、生活质量优良的粤港澳大湾区,成为珠三角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sup>④</sup>三是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同机制,主要包括制度、产业、环境治理等方面协同发展。相关文献指出,产业协同集聚有助于提升邻近城市的创新水平,然而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协同发展水平不高,<sup>⑤</sup>大湾区内各城市在市场运作机制和社会治理体系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异,<sup>⑥</sup>需要在机制的协调创新方面持续探索,加速实现大湾区城市群在制度机制上的协同对接。<sup>⑦</sup>

此外,也有相关研究对华侨华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互动进行关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张振江等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华侨华人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三者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逻辑关系,但该研究主要聚焦于粤籍华侨华人对粤港澳大湾区的贡献,在大湾区为华侨华人提供的机遇平台方面着墨较少;<sup>⑧</sup>李晓源和金晓艳等认为粤港澳大湾区为面向海外华人新生代的国际中文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契机,未来大湾区在加强粤港澳三地教育交流合作的同时,也应注重与东盟开展国际中文教育合作;<sup>⑨</sup>陈瑞娟主要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现状和存在问题,但文章未能从整体的角度对华侨华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互动进行探析。<sup>⑩</sup>可以看出,学界虽已有粤港澳大湾区的相关成果涌现,但其中对华侨华人与粤港澳大湾区互动进行直接关注的研究较少,在较具代表性的成果中,对华侨华人与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的主题进行系统性探讨的成果还存在研究空间。可以说,华侨华人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的逻辑理路和

① 郑永年、何冬妮 《世界湾区中的粤港澳大湾区: 如何打造引领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国际科创中心》,载《中国科学院院刊》2024年第9期。

② 陈广汉、刘洋 《从“前店后厂”到粤港澳大湾区》,载《国际经贸探索》2018年第11期。

③ Li, C., Ng, M. K., Tang, Y., et al., “From a ‘World Factory’ to China’s Bay Area: A Review of the Outline of the Development Plan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 Vol. 23, No. 2, 2022, pp. 310–314.

④ 陈林、张玺文 《建设统一大市场: 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的演化历程、经济规律与可借鉴经验》,载《国际经贸探索》2023年第5期。

⑤ 钟韵、秦嫣然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⑥ 毛艳华 《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载《南方经济》2018年第12期。

⑦ 张衍春、冯琰玮、徐元朔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合作与城市要素集聚演变及交互机制》,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3年第6期。

⑧ 王靖欣、张振江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华侨华人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载《青海民族研究》2023年第1期。

⑨ 金晓艳、赫天姣 《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国际中文教育集群联动发展研究》,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李晓源 《粤港澳大湾区搭建华人子弟研学交流桥梁》,载《人民论坛》2021年第18期。

⑩ 陈瑞娟 《粤港澳大湾区引进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的思考》,载《探求》2021年第3期。

政策意义等方面, 相关研究还留有一定的空间。

综上, 本文将结合近期对粤港澳大湾区各市政府工作部门和侨资企业<sup>①</sup>的实地调研材料, 综合近年粤港澳大湾区与华侨华人互动的最新动态, 以多维度视角分析华侨华人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的逻辑理路和动因, 这有助于从新视角进一步理解华侨华人与中国现代化的互动关系, 同时对于深入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积极引导华侨华人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要求也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

## 二、逻辑理路与开放维度: 华侨华人对粤港澳大湾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参与和贡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跨国主义视角下的“迁移—发展”范式(migration-development nexus)挑战了传统的依附理论视角下“脑力流失”(brain drain)等观点。<sup>②</sup>新范式认为, 远距离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空间压缩, 以及全球经济体系日益紧密的联系, 为国际移民与祖(籍)国保持密切联系创造了条件。国际移民具备的经济资本、专业技能和知识等资源的回流, 能够对祖(籍)国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今, 以往被认为受“脑力流失”现象影响的部分移民输出大国如印度、墨西哥和菲律宾等, 现已成为移民发展的重要受益国。<sup>③</sup>

在中国侨乡省份与海外侨胞的互动实践中, “迁移—发展”关系有其独特表现。广东省作为侨务资源大省, 其“面向海洋、面向港澳台、面向东南亚”<sup>④</sup>的地理区位格局, 决定了广东省的对外开放进程始终与华侨华人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 粤籍华侨华人与侨乡地区的联系十分紧密, 不少研究曾对华侨华人参与广东侨乡发展的路径进行总结, 相关研究聚焦侨乡的社会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文化转型等方面, 认为华侨华人主要通过侨商投资、侨汇和慈善事业等方式参与侨乡地区的发展。<sup>⑤</sup>相较以往华侨华人对传统侨乡地区发展的单向参与, 在广东省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责任主体

① 本文所指的“侨资企业”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登记的, 由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商人投资兴办的独立经营或者同境内企业合资合作经营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 原则上不含外国中资机构在境内的投资企业。具体详见龙登高、李一苇《海外华商投资中国40年: 发展脉络、作用与趋势》, 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

② De Haas, H.,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44, No. 1, 2010, pp. 227 - 264; Faist, T., “Migrants as Trans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ts: An Inquiry into the Newest Round of the Migration-development Nexus”,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Vol. 14, No. 1, 2008, pp. 21 - 42.

③ Portes, A., Yiu, J., “Entrepreneurship, Transnat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Migration Studies*, Vol. 1, No. 1, 2013, pp. 75 - 95.

④ 张小欣主编《海外华侨华人与广东改革开放40年》,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第4页。

⑤ See Graham, E. J., “Coming and Going: Pearl River Delta Identities in an Era of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in Tan, C. B. ed., *Chinese Transnational Network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23 - 48; Yow, C. H., “Transforming an Old Qiaoxiang: Impacts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on Panyu, 1979 - 2000”, in Tan, C. B. ed., *Chinese Transnational Network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49 - 70; 龙登高《粤闽侨乡的经济变迁——来自海外社会资源的影响》, 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郑一省:《东南亚华侨华人与当代闽粤侨乡制度的创新和变迁》, 载《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1期。

的新时代背景下<sup>①</sup>, 华侨华人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关系逐渐转向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双向互动关系。总体来看, 华侨华人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的逻辑理路在于: 华侨华人依托自身跨国资源禀赋, 通过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布局, 在多维领域发挥桥梁纽带与平台支点的作用, 进而推动大湾区开放格局、创新体系与文化软实力的协同提升。

具体而言, 新时代华侨华人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的机制主要体现在经济、科创和文化三个维度。在经济维度, 凭借雄厚的经济资本以及遍布全球的海外华商网络, 海外侨胞的投资优化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对外开放格局, 推动了企业经营模式的创新发展。同时, 海外华商网络在推动本土企业开展对外贸易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科创维度, 华侨华人群体利用自身掌握的前沿技术与行业联系建立起跨国知识网络, 为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创新型经济体系提供了智力支撑, 也为中外科技交流与合作搭建了桥梁; 在文化维度, 华侨华人依托其跨国文化身份推动了大湾区文化软实力的发展, 在推动岭南文化国际传播的同时, 也促进了其居住国文化与岭南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这些参与机制展现了区域发展与全球移民资源整合的互动共生关系。

#### (一) 经济维度: 海外华商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侨商投资在粤港澳大湾区对外贸易中长期占有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中来自华侨华人、港澳同胞的投资总额超过 3 600 多亿美元, 占全省实际外资比重超过 70%; 侨资企业超过 23.7 万家, 占广东省外资企业总数的比重超过 80%。<sup>②</sup> 进入广东省的侨资大部分流入了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 构成了粤港澳大湾区利用外资的主要部分。大量侨资的流入不仅为大湾区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 也在优化对外开放格局、推动经营模式创新以及开展跨国投资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一, 侨商投资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格局。全球生产网络理论认为, 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发展日益依赖于区域如何嵌入全球生产与服务体系, 并在其中占据高附加值环节。<sup>③</sup> 然而, 已有研究指出, 粤港澳大湾区原有的对外开放模式长期依赖于低端制造业与传统出口导向型产业, 横向对比世界四大湾区的产业结构, 粤港澳大湾区的工业经济属性明显, 但第三产业的比重较低, 尤其是在高端服务业方面与其他世界一流湾区仍存在差距。<sup>④</sup> 对此,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将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建成世界一流湾区的重要任务。<sup>⑤</sup> 实际上, 近年来进入粤港澳大湾区的侨

① 《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 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载南方网 2023 年 4 月 13 日, [https://www.southcn.com/node\\_07e973c1a3/93ffebd3a3.shtml](https://www.southcn.com/node_07e973c1a3/93ffebd3a3.shtml) 2024 年 10 月 24 日访问。

② 《10 个数字, “侨”见未来》, 载南方网 2023 年 2 月 26 日, [https://news.southcn.com/node\\_b23957126b/602d224e4b.shtml](https://news.southcn.com/node_b23957126b/602d224e4b.shtml), 2024 年 2 月 2 日访问。

③ 王艳华、郝均、赵建吉等 《从 GPN1.0 到 2.0: 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研究进展与评述》, 载《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7 年第 6 期。

④ 刘毅、王云、李宏 《世界级湾区产业发展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启示》, 载《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 年第 3 期。

⑤ 中共中央、国务院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24 页。

资行业分布结构正在加速调整。侨资转型的趋势为大湾区对外开放格局的优化升级贡献了动力。

21世纪以来,进入粤港澳大湾区的侨商投资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消费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型。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陈方豪博士利用基于工商注册信息构造的侨资企业数据库显示,2000年后进入广州的侨资企业中,进入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轻工业侨资企业占比从2000年的22%下降至2010年的4.5%。与此同时,从事消费服务业的侨企数量占比不断攀升,从2000年的7.7%攀升至2010年的38.2%。<sup>①</sup>另外,还有诸多侨企进一步转型升级,进入新兴产业中。截至2023年,大湾区内聚集了众多高新技术企业的“南粤侨创基地”已经发展至37个,基地内众多侨企涵盖了先进材料、生物医药和电子信息等契合大湾区产业升级方向的新兴行业。<sup>②</sup>

侨商投资在产业结构的上述转变,不仅符合大湾区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位置向服务化、知识密集型方向转变的总体趋势,也反映出该区域对高附加值环节的主动承接能力不断增强。这种投资流向的转变推动了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节点地位由“加工装配”向“创新引领”提升,从而提高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开放质量。

第二,侨资企业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经营模式创新发展。已有文献指出,移民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的最大优势在于其跨国身份所带来的信息优势,这使得他们可以将国际上成熟的经营管理模式带回(籍)国,并通过“示范—模仿”效应,实现现代化经营模式在祖(籍)国内推广。<sup>③</sup>华侨华人中的归侨企业家群体具备类似的跨国信息优势,该种优势一方面体现在他们具有良好的商业嗅觉,清楚国际上成熟的业内经营模式;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他们对祖(籍)国内市场规则的熟悉,能够将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在本土化改良后移植国内。<sup>④</sup>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众多侨资企业将现代化的经营模式与理念带入大湾区内各市,为早期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提供了良好的范本。例如,广州白天鹅宾馆第一次将“顾客至上”的服务理念带回中国,深圳竹园宾馆首次在中国实行“能上能下”的劳动用工制度等。<sup>⑤</sup>

新时代以来,侨资企业在粤港澳大湾区相关产业的经营理念与模式革新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广州GF健康产业集团(以下简称“GF集团”)将海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引入大湾区,顺利承接并实施了广州、深圳等城市的智慧养老示范项

① Chen, F., Xiong, R., Zhang, X., “Familiar Strangers: The Role of Diaspora Networks i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Long-run Development”,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Working Paper, No. 4004159, January 2022, <https://papers.ssrn.com/abstract=4004159>, Last visited on Dec. 22 2025.

② 《南粤侨创基地分布》,载广东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网站2023年6月30日, <http://www.gdql.org.cn/hdzt/qsdh/yzs/qcjd/gz/index.html>, 2024年2月2日访问。

③ Nkongolo-Bakenda, J. M., Chrysostome, E. V., “Engaging Diasporas as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Search of Determinan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Vol. 11, No. 1, 2013, pp. 30–64.

④ 陈方豪、熊瑞驰 《以侨为桥——侨资企业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载《中国经济学》2022年第1期。

⑤ 李霞 《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年启示》,载人民画报网2018年5月25日, <http://www.chinareports.org.cn/jryw/2018/0525/4699.html>, 2025年12月22日访问。

目,推动了大湾区养老服务业模式的创新,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在笔者对GF集团负责人L先生的访谈中,L先生介绍了GF集团作为侨企的跨国经营理念与经验“在东亚儒家文化圈,孝道文化比较接近,比较提倡(老人)接近下一代子女,养老机构是建在社区里,服务以上门服务为主、托养为辅,比如说日本都是以社区养老为主,很少像欧美一样在大型的老年社区养老。所以我们就定位在社区养老,以上门服务为主。”谈到GF集团的国际交流项目,L先生表示“我们作为侨资企业其实国际化程度是非常高的,我们在新西兰、日本也有养老项目和合作基地”“其中一个股东有日资背景,我们的培训标准、管理运营甚至服务理念都和在日本的(养老)机构有很深的交流”。关于GF集团在中国市场的成功经验,他认为“我们在本土化上比外国人有优势,纯外国公司完全把他那一套搬到中国是水土不服的,很多日本上市公司(在中国)做养老全都失败了。”“再加上我们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也有一些合作伙伴,可以把很多香港的好的社工理念、康复设备引入内地。”(所以)我们相对成功是(因为)我们只把好的理念引进来,可是我们扎根在本土,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一样的,我们完全适应这里的文化。”<sup>①</sup>

GF集团的案例体现了侨资企业在推动大湾区企业经营模式创新方面的独特作用。一方面,L先生作为侨资企业家对各个国家、地区的养老模式均有着较深的理解,能够在比较分析中筛选适用于中国国情的经营理念;另一方面,GF集团作为侨资企业具备明显的跨国文化优势。相较于内地企业,GF集团与国际接轨的程度更高,其在国内的项目与新西兰、日本等国有着较密切的交流合作关系。相较于其他非侨资的外资企业,GF集团领导层更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在养老服务业可以做到更加彻底的本土化经营,能够结合中国本土实际对已引入的经营模式予以适应性改良。凭借上述双重文化身份,以GF集团为代表的众多侨资企业扮演了中外企业经营模式的“制度中介”,通过在制度移植过程中将业内成熟经验进行选择转化,并在本土语境中对原有模式进行改良与再造,从而推动大湾区企业经营模式的变革创新。

第三,海外华商网络便利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对外贸易。已有的实证研究显示,移民网络的存在能够显著降低移民祖(籍)国与居住国之间的贸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从而促进两国之间的经济活动。<sup>②</sup>在大湾区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华商网络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充当了粤港澳大湾区与侨胞居住国之间的桥梁纽带。具体而言,近年来海外粤商助力大湾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方式主要分为以下三种:一是利用海外华商熟知当地市场、文化、规则的信息优势,为大湾区企业提供本土法律方案。例如,越

<sup>①</sup> 访谈片段来自2023年10月笔者对GF健康产业集团负责人L先生的访谈材料。括号内文字为笔者为增强材料表达流畅程度而补充。

<sup>②</sup> Leblang, D., “Familiarity Breeds Investment: Diaspora Networks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4, No. 3, 2010, pp. 584–600; Martínez-Zarzoso, I., Rudolf, R., “The Trade Facilitation Impact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The World Economy*, Vol. 43, No. 9, 2020, pp. 2411–2436.

南粤商会为来越投资的广东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帮助他们合法合规地在海外发展成长。二是利用海外华商成熟的关系网络,为大湾区企业进入居住国市场提供关键的进入渠道与协助。例如,墨西哥粤商会协助多家中资企业进行选址对接、生产厂房的施工建设、原物料采购、人员招聘等方面的工作。三是本土企业通过与海外华商企业合作间接获取居住国外资企业优惠待遇。例如,泰国粤商会开发的泰国广东工业园为中资企业提供诸多优惠,包括免去企业所得税、进口机械关税、进口原材料关税等。<sup>①</sup>

众多海外粤商助力大湾区企业“走出去”的案例表明,华商网络为国内企业对接海外侨商资源、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重要平台。华商网络之所以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关键性桥梁作用,其原因在于海外华商在双重嵌入祖(籍)国与居住国的状态下,利用自身在居住国所积累的社会资本以及与祖(籍)国企业在文化上的亲近感,为大湾区企业跨境投资提供了信任基础与沟通桥梁等关键的软性支持。<sup>②</sup>借助海外华商网络,祖(籍)国企业得以利用海外华商对当地政治、经济、法律环境信息的熟知,克服进入海外市场中可能遭遇的制度、语言与文化障碍,进而在跨国投资中最大化地实现市场对接与风险规避。

## (二) 科创维度: 华侨华人专业人才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

近年来针对中国、印度等国家的研究表明,技术人才的迁移对祖(籍)国而言并非单向的“脑力流失”,相反,从长期视角看,技术移民群体日益成为前沿知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关键媒介。<sup>③</sup>当移民在国外接受教育或学习专业技能,并通过回国或者移民知识网络将已掌握的技能、知识转移至祖(籍)国时,祖(籍)国因人才流失而遭受的损失便可以得到减轻乃至扭转,这一现象称为“脑力循环”(brain circulation)。近年来,众多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在粤港澳大湾区高新科技行业中的创新实践为“脑力循环”的观点提供了有力证据。

第一,回流高层次人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高新产业发展。美国移民学者安娜李·萨克森尼安(AnnaLee Saxenian)将那些在发达国家接受专业训练,熟练掌握技能后仍保持与祖(籍)国经济、技术联系的移民技术人才称为“新阿尔戈英雄”(new Argonauts),<sup>④</sup>

① 尹珏文 《2024 海外粤商年会在穗举办,新增4家海外粤商会》,载南方网 2024 年 1 月 29 日, [https://news.southcn.com/node\\_d16fad650/a94457b824.shtml](https://news.southcn.com/node_d16fad650/a94457b824.shtml), 2024 年 2 月 7 日访问。

② 任娜、刘宏 《本土化与跨国性——新加坡华人新移民企业家的双重嵌入》,载《世界民族》2016 年第 2 期。

③ Zweig, D., Fung, C. S., Han, D., “Redefining the Brain Drain: China’s ‘Diaspora Opti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Vol. 13, No. 1, 2008; Pande, A., “The Role of Indian Diaspor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an IT Industry”, *Diaspora Studies*, Vol. 7, No. 2, 2014, pp. 121 - 129.

④ 在古希腊神话中,阿尔戈英雄(Argonauts)是一群乘坐“阿尔戈号(Argo)”为寻找金羊毛出海冒险的英雄团队,而“新阿尔戈英雄”则用以隐喻硅谷中以华人、印度人技术移民为代表的新一代跨国创业者凭借勇气与协作精神构建全球经济联结的角色。Saxenian, A., “From Brain Drain to Brain Circulation: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and Regional Upgrading in India and Chin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40, No. 2, 2005, pp. 35-61.



她指出, 21 世纪以来在美国硅谷工作的众多华裔、印度裔技术移民正通过构建横跨太平洋的“移民知识网络”( diaspora knowledge networks), 帮助其祖籍地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对接国际市场并获取技术与管理经验。<sup>①</sup>

在当今的粤港澳大湾区, 不少华侨华人专业人才扮演着“新阿尔戈英雄”的角色, 他们在海外高新技术行业积累一定经验后选择返回祖(籍)国, 并通过创办科技企业促进知识的转移。近年来, 华侨华人已是粤港澳大湾区引进人才的主力军, 众多华侨华人专业人才通过归国创业将国际前沿技术、专利带回中国。数据显示, 2013—2018 年, 广东全省共引进约 6 万名海外人才, 华侨华人在其中占比超过 70%。<sup>②</sup> 改革开放以来, 超过 5.8 万名华侨华人专业人才在广东省创办了 3 000 余家高新技术企业, 这些企业主要分布在电子信息、精密制造、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高科技行业。<sup>③</sup> 这些高新技术企业填补了大湾区在部分核心技术环节上的空白, 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构建产学研一体化创新平台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例如, 邹鸿志博士创办的康立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率先研制出国内首个肠癌粪便 DNA 检测试剂盒;<sup>④</sup> 归侨周荣博士则通过在呼吸疾病领域的跨国研究经验, 实现了生物医药科研的在地化转化。<sup>⑤</sup>

更重要的是, 身处跨国社会场域、具备高新技术行业跨国工作经验的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具备建立所谓“移民知识网络”的潜力。<sup>⑥</sup> 众多归国高层次人才在海外科技行业中积累的丰富社会关系在他们归国后仍得以保留, 这有助于他们在高新技术行业建立国际交流机制, 进而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对全球创新资源的整合与配置能力。

第二, 归侨科创平台对接海内外高新技术产业。除了个人直接创办科技企业实现海外先进技术的转化落地外, 一些移民还通过搭建科研合作平台的方式, 为其他归国专业人才在国内创业提供必要的缓冲机制。当前, 部分华侨华人专业人才在海外从事科研工作多年, 当他们带着资金和技术返回大湾区创业时, 可能会因海内外环境差异而面临一定的适应困难。广东省华侨华人创新创业促进会会长范群曾总结海归人才创业的两大主要挑战: 首先, 由于海内外市场环境的差异, 海外尖端技术在国内的移植

① Saxenian, A., “Silicon Valley’s New Immigrant High-growth Entrepreneurs”,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Vol. 16, No. 1, 2002, pp. 20-31.

② 《近五年广东引进海外人才中华侨华人超七成》, 载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网站 2018 年 9 月 28 日, [http://www.qb.gd.gov.cn/mfz/content/post\\_153559.html](http://www.qb.gd.gov.cn/mfz/content/post_153559.html), 2023 年 9 月 24 日访问。

③ 《10 个数字, “侨”见未来》, 载南方网 2023 年 2 月 28 日, [https://news.southcn.com/node\\_b23957126b/602d224e4b.shtml](https://news.southcn.com/node_b23957126b/602d224e4b.shtml), 2024 年 2 月 2 日访问。

④ 参考资料来自 2023 年 6 月笔者参与的政企座谈会资料以及部分网络文献。陈辉 《一步一个脚印做出高质量筛查 用科技帮助千家万户肠道安心》, 载《羊城晚报》2023 年 12 月 22 日, 第 3 版, [https://ep.ycwb.com/epaper/ycwb/html/2023-12/22/content\\_832\\_620872.htm](https://ep.ycwb.com/epaper/ycwb/html/2023-12/22/content_832_620872.htm), 2025 年 12 月 22 日访问。

⑤ 《第八届侨界贡献奖人物风采录》, 载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网站 2021 年 3 月 19 日, <http://www.chinaql.org/n1/2021/0319/c419752-32055715.html>, 2024 年 2 月 5 日访问。

⑥ Yevgeny, K., Charles, 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Talent, Diaspora Networks, and Development: Overview of Main Issues”, Yevgeny, K., ed., *Diaspora Networks and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Skills: How Countries Can Draw on Their Talent Abroad*,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2006, pp. 3-7.

过程往往不够顺利;其次,中外融资渠道及相关习惯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华侨华人在回国后普遍面临资金短缺和团队缺少的问题,从而影响创业的顺利启动。<sup>①</sup>

面对这些困境,部分华侨华人专业人才回国后,利用自身在海内外高科技行业积累的广泛影响力创办国际科技合作平台,为大湾区对接海外人才搭建桥梁。在该方面,范群及其创办的广州归谷科技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归谷科技园”)是一个典型。<sup>②</sup>归谷科技园通过联动广州欧美同学会、华侨华人创新创业促进会等归侨社团资源,形成涵盖海外人才引进、科研项目孵化、金融服务支持等多维功能于一体的协作平台。一方面,归谷科技园通过整合众多海内外专业人才的联系纽带,使得园区成为海内外专业人才科研交流的重要平台;另一方面,归谷科技园为归侨企业家提供相对成熟的创业生态和融资环境,以减少海归人才融入大湾区创业环境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与适应成本。

以归谷科技园为代表的众多平台型侨资企业的出现,意味着华侨华人专业人才的回流对中国的意义不仅仅停留于脑力循环理论所提出的“推动祖(籍)国科技进步”方面,他们还通过在跨文化、跨制度环境之间建立缓冲机制,为众多海归人才融入大湾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对接通道。该种缓冲机制的建立充分发挥了华侨华人专业人才的跨国网络优势,有助于大湾区在全球人才竞争格局中构建具有吸引力和适应性的人才治理体系。

### (三) 文化维度: 华侨华人推动岭南文化的国际交流互鉴

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理论指出,国家和区域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也同样依赖于文化吸引力、价值观认同与制度范式的传播能力。<sup>③</sup>在软实力的构成中,文化被视为核心要素之一。相较于政府主导的官方文化输出,作为非政府行为体的移民主导的文化传播往往具有“去政治化”“日常化”等特征,更容易被居住国主流社会群体接受与认同,因而在提升国家形象、增强文化认同方面具有独特优势。<sup>④</sup>

粤港澳三地共受岭南文化滋润,兼收并蓄的岭南文化赋予了粤港澳大湾区丰厚的人文底蕴与软实力基础。华侨华人群体作为跨国群体长期处于不同国家文化的交接地带,在跨文化传播方面具备天然优势。早期岭南文化随着粤籍华侨华人海外移民的步伐扩散到世界各地,醒狮、粤剧、粤菜等岭南特色文化元素在海外华人聚居区随处可

① 陈晨、许晓鑫 《留美博士范群: 从硅谷到归谷,他把上千名海归带回中国》,载南方网 2023 年 2 月 26 日, [https://news.southcn.com/node\\_c188d1eb30/0acf9a48ee.shtml](https://news.southcn.com/node_c188d1eb30/0acf9a48ee.shtml), 2023 年 11 月 3 日访问。

② 参考资料来自 2023 年 6 月笔者调研归谷科技园时园方提供的文件。归谷科技园曾先后被确认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海归之家、欧美同学会(广州·生物医药)海归小镇起步区以及“南粤侨创基地”。

③ Nye, J. S.,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Vol. 80, 1990, pp. 153 - 171.

④ 陈奕平、范如松 《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 作用、机制与政策思路》,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 年第 2 期。

见,并且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国海外形象的认知符号。<sup>①</sup>近年来,华侨华人通过推动岭南文化“走出去”以及将国外优秀文化“引进来”的方式,同时促进了岭南文化和外国优秀文化的跨国界再生产。在此过程中,华侨华人在明显增强岭南文化海外传播度和认可度的同时,也通过引入其居住国文化元素丰富了岭南文化的底蕴,因而在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软实力建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一,华侨华人推动岭南文化海外传播。近年来,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迅速提升,在岭南文化“出海”的过程中,众多粤籍华侨华人经由华人社团、华文传媒等渠道,积极推广现代岭南文化,并向国际社会介绍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发展成就。具体而言,粤籍华侨华人遍布世界各地,规模超过3 000万<sup>②</sup>,他们为岭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广泛的基础。一方面,海外粤籍华侨华人在中国传统节日举办的节庆活动成为展示岭南文化的重要平台。如2025年法国侨界社团在巴黎举办的春节庆祝活动中,广东醒狮、潮汕英歌舞等富有岭南特色的节目引起法国当地群众的广泛关注。<sup>③</sup>另一方面,华侨华人在当地开设的粤菜馆、武馆等,也为各国人民提供了近距离感知岭南文化的场所。

众多海外华文媒体也构成了大湾区提升海外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渠道。近年来,华文媒体和侨刊乡讯通过多种形式向世界各国传递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动态。其中,侨刊乡讯是连接海外侨胞与家乡的重要信息渠道。2023年,广东省的侨刊乡讯已经发展至150家,覆盖175个国家,年发行量达到2 700万份。<sup>④</sup>凭借广泛的发行网络,侨刊乡讯将家乡最新信息传递至海外侨胞,推动了岭南文化的在地化传播;此外,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华文报纸也逐步成为岭南文化海外传播的主要渠道,众多华文报纸将大湾区近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以各种语言向国际社会报道,显著提升了粤港澳大湾区在国际社会的文化认知度与影响力。<sup>⑤</sup>

第二,华侨华人促进其居住国文化与岭南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众多粤籍华侨华人在居住国传播岭南文化的同时,也致力于将居住国的优秀文化带回岭南地区。在粤港澳大湾区,华侨华人引入居住国特色文化并对本地文化产生影响的事例并不少见。例如,江门市的咖啡文化和咖啡产业就与华侨华人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拥有悠久移民历史的“侨都”江门,咖啡作为西方世界日常消费的饮品在19世纪60年代被华侨引入江门地区,此后,咖啡饮品逐渐融入当地人的饮食文化。巴西江门五邑青年联合总会

① 刘彭泽、陈奕平等《华侨华人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2页。

② 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侨乡侨情》,载广东省人民政府网站2023年3月24日,https://www.gd.gov.cn/zjgd/sqgk/qx-qq/index.html,2024年11月26日访问。

③ 李洋《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新春舞龙舞狮活动登场》,载中国新闻网2025年2月3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hr/shipin/cns-d/2025/02-03/news1012278.shtml,2025年2月6日访问。

④ 《“集体家书”的百年接力》,载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2023年5月11日,http://www.qb.gd.gov.cn/qwdt/content/post\_1055485.html,2025年2月5日访问。

⑤ 崔锦宁《2023海外华文传媒合作组织年会圆满落幕 八大全新亮点开创国际传播新篇章》,载亚洲日报网2023年11月20日,https://www.yazhouribao.com/view/20231120130525620,2024年11月6日访问。

会长陈文添曾表示“南美有很多咖啡豆产地。老一辈华侨在南美喝惯咖啡后，总会把咖啡豆带回家乡让亲友品尝。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sup>①</sup>如今，咖啡文化已是江门本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咖啡文化延伸形成的咖啡产业也已成为江门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sup>②</sup>可以说，经由华侨华人引进的咖啡文化对江门的本地文化乃至社会经济都产生了显著影响，类似的案例还包括开平碉楼建筑中的巴洛克元素、中山华侨引进的南洋饮食文化等。这些文化融合现象丰富了祖(籍)国与居住国的文化样态，说明华侨华人身上具备的跨国性使其成为不同文化间交流的良好纽带。

### 三、情感认同与结构性机会：华侨华人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的动因

相关国际经验表明，国际移民与祖(籍)国之间跨国联系的建立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要让移民对参与祖(籍)国发展建设产生积极性，既需要强调侨缘纽带的联系，也需要祖(籍)国提供友好的政策环境。<sup>③</sup>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背景下，华侨华人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的动因，一方面取决于其文化归属与情感认同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也受到粤港澳大湾区提供的诸多结构性发展机会的吸引。情感认同与结构性机会相结合，使得华侨华人得以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找到制度嵌入的空间并获得行动激励，从而构成了华侨华人参与大湾区对外开放的动因。

#### (一) 华侨华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切期盼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来看，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切期盼，构成了他们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的情感动因。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侨务工作的“根魂梦”论述中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sup>④</sup>这一论述从共同体建构的角度，强调了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部分的身份归属与历史责任。基于广大侨胞对祖(籍)国的情感、多维的认同与义利观，海外侨胞理应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共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sup>⑤</sup>

首先，华侨华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命运相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外侨胞的共

① 《江门侨都咖啡文化周上咖香四溢》，载南美白报网 2024 年 2 月 27 日，[http://www.br-cn.com/static/content/news/ch\\_news/2024-02-27/1212093113746081268.html](http://www.br-cn.com/static/content/news/ch_news/2024-02-27/1212093113746081268.html)，2025 年 2 月 5 日访问。

② 《一杯咖啡喝出全产业链发展新活力》，载《南方日报》2024 年 12 月 24 日，第 2 版，[https://epaper.nfnews.com/nfdaily/html/202412/24/content\\_10122107.html](https://epaper.nfnews.com/nfdaily/html/202412/24/content_10122107.html)，2025 年 2 月 6 日访问。

③ Gamlen, A., Cummings, M. E., Vaaler, P. M., "Explaining the Rise of Diaspora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 45, No. 4, 2019, pp. 492-516.

④ 刘维涛、王尧、兰兆光《习近平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强调“共同的根共同的魂共同的梦，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发展新篇章”》，载《人民日报》2014 年 6 月 7 日，第 1 版。

⑤ 陈奕平、关亦佳《海外侨胞与中华民族多维空间的拓展》，载《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 年第 3 期。

同期盼。华侨华人在海外的社会尊严、安全保障和发展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祖(籍)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在清末中国积贫积弱时期,晚清政府无力维护华侨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众多侨胞在居住国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下,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遭受政治和经济上的多重歧视,在排华浪潮最高峰时甚至形成了诸如美国1882年《排华法案》等制度化的种族歧视。<sup>①</sup>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许多国家出于加强与中国政治、经贸往来的考虑,开始更重视华侨华人的作用,海外侨胞在居住国的合法权益由此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其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随之不断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在海外侨胞的人身安全因居住国突发事件而面临威胁时,中国政府展现出更有力的海外保护能力,例如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保护海外侨胞人身安全而在利比亚、也门等国开展大规模的撤侨行动,就很好地说明了综合实力强大的祖(籍)国在维护海外侨胞权益方面的坚强作用。因此,祖(籍)国的衰弱与强盛直接牵动着海外侨胞的命运。正是在海外侨胞与祖(籍)国形成“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海外侨胞的共同期盼。

其次,作为民族共同体的一员,海外侨胞同样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受益者,利用自身跨国身份所带来的跨文化优势,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为海外侨胞提供了更多机遇,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整合祖(籍)国和居住国的资源以促进自身的发展。<sup>②</sup> 当华侨华人从祖(籍)国的发展成就中感受到实质性利益时,华侨华人对中华民族(华族)和中华(华人)文化的认同就必然呈现加强的趋势。<sup>③</sup> 例如,近年来中国国力的增强明显提高了中华文化的吸引力,促使更多侨胞主动学习、传承中华文化以更好地与祖(籍)国的发展接轨。正如马来西亚华人学者陈志明指出:“中国崛起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和实用性。对马来西亚华人而言,学习中文不仅能够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也意味着能在与中国经济的往来中获得更多利益。”<sup>④</sup> 这一观点也印证了祖(籍)国发展对侨胞文化认同的强化作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日益密切,华侨华人新移民<sup>⑤</sup>的增多也为海外华人社会注入了新鲜血液。华侨华人新移民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对中华文化认同较为强烈,这些新移民在居住国积极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当地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认知与认同,进而增强了海外华人社会对中华文化的集体认同。

华侨华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切期盼,是他们愿意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以及

① 潮龙起 《当代中国民族复兴话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以近年中国政府涉侨言论为中心的考察》,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2期。

② 周聿峨、龙向阳 《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③ 陈奕平等著 《多元与共识: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34页。

④ Ngeow, C. B., Tan, C. B., "Cultural Ties and States' Interests Malaysian Chinese and China's rise", in Wong, B. P., Tan, C. B., ed., *China's Rise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p. 96-98.

⑤ 华侨华人新移民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中国大陆、台湾和港澳地区移居国外并长住一年以上者。详见庄国土 《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新估算》,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大湾区对外开放的前提。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是必由之路,而粤港澳大湾区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东省时提出“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广东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机遇”,赋予了粤港澳大湾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的新定位。<sup>①</sup>可以说,粤港澳大湾区承载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验证。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海外侨胞自然希望通过投身大湾区对外开放建设,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 (二) 粤港澳大湾区为华侨华人提供实现自我价值的结构性机会

艾辛杰(P. K. Eisinger)和莫顿(Robert K. Merton)等人提出机会结构理论(opportunity structure theory)强调,个体或群体能否实现其目标,不仅依赖其主观意愿和能力,还取决于其所处环境是否提供相应的制度通道、资源支持等结构性机会。<sup>②</sup>同样,移民个体的行为和发展路径也受到其所处环境中可获得机会的结构性影响。<sup>③</sup>如库普曼(Ruud Koopmans)等人指出,制度性机会结构(如政策环境、法律框架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移民群体的参与路径和程度。<sup>④</sup>在华侨华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互动中,机会结构同样深刻形塑了华侨华人对大湾区对外开放的实践路径,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粤港澳大湾区的涉侨服务通道为华侨华人投资兴业提供便利。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和澳门两地是大部分华侨华人资本进入中国内地的“中转站”。近年来,随着大湾区推进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侨资跨境流通过程进一步畅通。例如,江门市通过实行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试点打通侨资投资通道、设立离岸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保障侨胞权益,在跨境金融服务、涉侨法律服务改革等方面优化为侨服务机制。同时,为吸引侨界专业人才,大湾区各市也出台了一系列便利人才流动和居留的政策,如“往来港澳人才签注”<sup>⑤</sup>“人才优粤卡”<sup>⑥</sup>等,并通过提供税收补贴等方式增强对海外高层次人

① 《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载南方网 2023年4月13日, [https://www.southcn.com/node\\_07e973e1a3f93ffebd3a3.shtml](https://www.southcn.com/node_07e973e1a3f93ffebd3a3.shtml), 2024年10月24日访问。

② Eisinger, P. K., “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7, 1973, pp. 11–28; Merton, R. K., “Opportunity Structure: The Emergence, Diffus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a Sociological Concept, 1930s–1950s”, Adler, F., Laufer, W. S., ed., *The Legacy of Anomie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3–5.

③ Solano, G., Schutjens, V., Rath, J., “Multifocality and Opportunity Structure: Towards a Mixed Embeddedness Model for Transnational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 Vol. 10, No. 1, 2022, pp. 1–24.

④ Koopmans, R., Statham, P., “Migration and Ethnic Relations as a Field of Political Contention: An Opportunity Structure Approach”, in Koopmans, R., Statham, P., ed., *Challenging Immigration and Ethnic Relations Politics: Comparative European Perspec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3–56.

⑤ 《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试点实施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政策的公告》,载国家移民管理局网站 2023年2月29日, <https://www.nia.gov.cn/n741440/n741542/c1559643/content.html>, 2024年2月16日访问。

⑥ 《我市深入推进便利华侨华人投资制度改革试点 以“侨”为桥做好新时代“侨”的文章》,载江门市人民政府网站 2023年8月28日, [https://www.jiangmen.gov.cn/home/bmdt/content/post\\_2924190.html](https://www.jiangmen.gov.cn/home/bmdt/content/post_2924190.html), 2024年2月11日访问。

才的吸引力。<sup>①</sup>

第二, 粤港澳大湾区建立的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平台为侨胞实现自我价值提供载体。一方面, 世界粤商大会、华侨华人粤港澳大湾区大会等高层次侨务会议, 为海外华裔提供了政策对接与资源整合的窗口, 成为推动侨资项目落地的重要平台。另一方面, 以“侨梦苑”<sup>②</sup>为代表的众多创新创业平台为海外专业人才提供更具针对性和差异化的空间支持与激励机制。据统计, 截至 2024 年初, 广州、汕头、江门三地侨梦苑已累计引进人才 1 500 余人, 入驻企业 1 600 多家, 吸引投资超 500 亿元。<sup>③</sup> 此外, 横琴、前海与南沙等重点平台对侨资企业提供的税收优惠与奖补政策, 进一步拓展了侨商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制度嵌入空间。<sup>④</sup>

可以看出, 粤港澳大湾区面向海外侨胞的系列政策构成了具有较强开放性和普惠性的制度机会网络, 该种以服务体系、制度通道与资源平台构成的政策组合形成了海外侨胞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的结构性机会, 正是该种结构性机会激发了海外侨胞对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的参与意愿, 并将其对祖(籍)国的情感认同有效转化为参与实践。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 华侨华人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不仅源自祖(籍)国的“拉力”, 也受到侨胞居住国“推力”的影响。近年来, 随着部分西方国家族群关系趋紧以及亚裔群体政治参与和事业晋升空间的持续受限, 这一“推力”愈加明显。2024 年, 美国华人精英社团百人会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有 68% 的美籍华人表示每月会遭受至少一种形式的歧视。<sup>⑤</sup> 此外, 随着近年来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包括华人在内的亚裔在西方国家的事业发展也遭受更多限制。<sup>⑥</sup> 根据毕马威公司在 2024 年发布的关于美国亚裔高管的研究报告, 尽管亚裔美国人受教育程度较高, 且占美国专业劳动力的 14%, 但在美国大型企业的高管职位中, 亚裔的占比只有 6.4%。<sup>⑦</sup> 这一差距表明,

① 2023 年 6 月, 广东省多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规定, 在粤港澳大湾区工作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 按其缴纳个人所得税中已缴税额超过应缴税额的 15%, 由珠三角九市政府提供税收补贴。详见《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粤财税〔2023〕21 号)。

② “侨梦苑”是由国侨办与地方政府共建的侨商产业聚集区和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基地。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广州、江门和汕头三地都建有侨梦苑, 三地侨梦苑为入驻的先进技术侨企提供奖金、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详见广州市增城区政府网站, [https://www.zc.gov.cn/tz/qmy/index\\_2.html](https://www.zc.gov.cn/tz/qmy/index_2.html), 2024 年 11 月 7 日访问 《江门“侨梦苑”核心区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江开发〔2021〕4 号)。

③ 龚春辉、汪棹樾 《广东创新实施“侨助广东高质量发展行动”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侨动力”》, 载南方网 2024 年 2 月 29 日, [https://news.southcn.com/node\\_54a44f01a2/8afa21353b.shtml](https://news.southcn.com/node_54a44f01a2/8afa21353b.shtml), 2024 年 10 月 28 日访问。

④ 详见《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粤财税〔2023〕21 号)。

⑤ Chan, N. K. M., Leung, V., Collitt, S., *State of Chinese Americans National Survey*, Committee of 100, NORC, October 2024, <https://www.committee100.org/media-center/committee-of-100-and-norc-release-full-report-state-of-chinese-americans-national-survey/>, Last visited on Dec. 22 2025.

⑥ 潮龙起 《当代中国民族复兴话语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以近年中国政府涉侨言论为中心的考察》, 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2 期。

⑦ Barrett, A., *Asian representation on Fortune 1 000 boards: 2023 Edition*, KPMG, Ascend Pinnacle. April 2024, <https://kpmg.com/us/en/media/news/asian-corporate-board-representation-report-kpmg-2024.html>, Last visited on Dec. 22 2025.

包括华人在内的亚裔在职业发展上仍面临着“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的不平等限制。当华侨华人在居住国面临种族歧视、“玻璃天花板”等不平等限制时,稳步扩大对外开放的粤港澳大湾区为华侨华人提供了良好的发展选择,因而引起海外侨胞的极大兴趣。

#### 四、理论反思与政策展望: 华侨华人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的经验与启示

本文通过分析华侨华人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逻辑理路与参与动因,为中国在新形势下借助华侨华人力量实现高水平、全方位对外开放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发现,新时代华侨华人结合自身资源优势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在经济、科创和文化等多个维度深度参与了大湾区的对外开放。同时,华侨华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切期盼,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为华侨华人提供的良好平台和机遇,则构成了华侨华人参与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条件。值得关注的是,新时代华侨华人与粤港澳大湾区协作关系的深化,不仅推动了大湾区的科技创新、经济繁荣与文化互通,也为全球华人社会提供了更多发展机遇。

在理论层面,国际移民与祖(籍)国现代化发展的关系一直是国际移民研究领域颇具争议性的话题。部分学者强调国际移民导致了祖(籍)国的“脑力流失”,使得祖(籍)国对国民巨大教育与培训的投入无法得到应有回报,加剧了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源短缺与社会经济困境;<sup>①</sup>然而,近年来学界逐渐认识到,国际移民的迁移并不意味着完全断绝与祖(籍)国的联系,事实上,他们通过汇款、投资与技术转移等方式,在多重维度上促进着祖(籍)国现代化建设。<sup>②</sup>对于这一争议,笔者也曾指出,“需要注重多层次、多地域的各种国家内部的和跨国的环境”“从治理视角探讨治理理念、政策设计、制度构建、项目实施等方面国际合作的可行性和实施路径”<sup>③</sup>。本文则通过梳理华侨华人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跨国互动,进一步揭示了移民与祖(籍)国之间建立互利共赢关系的可能性,为国际移民与祖(籍)国现代化之间良性关系的建立提供了新的依据。

粤港澳大湾区与华侨华人的互动实践经验表明,国际移民与祖(籍)国之间的关系并不限于单向流动或“脑力流失”的零和关系,二者关系还可以是在移民群体资源优势深度契合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化安排、平台化支持与情感认同机制

① De Haas, H.,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44, No. 1, 2010, pp. 227 - 264.

② Faist, T., Fauser, M., “The Migration-Development Nexus: Toward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in Faist, T., Fauser, M., Kivisto, P., eds., *The Migration-Development Nexus: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 1 - 26

③ 陈奕平 《海外侨胞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历史逻辑和新时代启示》,载《世界民族》2023年第2期。



得以激活和持续的互利共赢关系。粤港澳大湾区正是通过打造包容性强、治理体系完善且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平台，有效建立了华侨华人与祖籍地之间在资本回流、知识转移与文化传播等方面的良性互动机制，提供了一个国家主动整合侨力促成移民与祖(籍)国合作共赢的、具有粤港澳大湾区特色的“迁移—发展”新范式，并为探索全球范围内国际移民有效参与祖(籍)国发展的路径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实践样本。另外，该种合作共赢关系的形成，不仅有赖于移民对祖(籍)国的情感认同，更需要祖(籍)国政府持续且主动的政策引导，通过主动将移民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为其在祖(籍)国内的创新创业、文化交流提供充足的结构性的机会。

为在将来继续维持和强化华侨华人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互利共赢的关系，粤港澳大湾区应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与“十五五”规划建议，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亲诚惠容”理念，通过积极回应海外侨胞分享祖(籍)国发展红利的意愿、诉求，进一步拓展侨胞参与祖(籍)国发展的机遇空间，从而在实现华侨华人、祖(籍)国、居住国三方共赢的基础上，汇聚全球华侨华人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建世界一流湾区，实现华侨华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良性互动。

具体而言，首先，应实行更加开放且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吸引侨资。新时代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被赋予了“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的更高使命，这要求大湾区优化外资产业结构，以更大的政策优惠力度吸引侨资外资。<sup>①</sup> 可以鼓励重点侨乡先行开展便利华侨华人投资制度试点，并加大面向侨资的政策优惠力度。另外，还应支持各地建设类似“侨梦苑”的面向华侨华人的创新创业平台，为华侨华人在大湾区增资扩产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其次，在制定引进外来人才的政策时，应深入了解归国华侨华人的需求，并在政策细节上给予相关关注。相关部门应在加快留学人员创业园和海外专业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等配套设施建设的同时，还应着力解决医疗保险、配偶就业、子女教育及生活设施等问题，为华侨华人专业人才创造良好的归国生活环境。

最后，应加强海外侨胞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情感认同。新时代以来，大湾区各市侨情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华侨华人新生代逐渐成为归侨主力军；另一方面大量非原籍的新侨、归侨前来粤港澳大湾区安家落户、投资兴业。相较于老一辈华侨华人以及原籍的华侨华人，华裔新生代以及非原籍的归侨对大湾区内各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可能更为淡薄。对此，通过设立内容、形式更加丰富的文化交流项目维系海外侨胞对大湾区各市的情感认同，增进归侨群体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了解与认同，显得尤为必要。

<sup>①</sup> 中共中央、国务院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2 页。

##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Opening-up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Logical Path and Policy Significance

CHEN Yiping , CAO Jinzhou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mounting headwinds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rising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 how to sustain high-standard opening-up amid a complex external environment has become a salient practical issue in China 's modernizatio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 GBA ) constitutes a key gateway for China 's opening-up and performs a critical function in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Additionally , overseas Chinese , by virtue of their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 play an irreplaceable bridging and intermediary role in connecting the GBA with the world. However , existing studies on the GBA have largely approached the topic from perspectives such as regional economics , spatial structure , or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 while systematic analyses of how overseas Chinese participate in and shape the GBA 's opening-up remain relatively limite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and internal logic thus warrant further investigation.

Grounded in the migration-development nexus and transnationalism theory , this paper employs policy text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to examine the practices through which overseas Chinese engage in the GBA 's opening-up. Drawing on fieldwork conducted in multiple GBA cities in recent years ,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overseas Chinese participation across the economy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 and cultural exchange dimension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overseas Chinese , leveraging their transnational economic capital , professional expertise ,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 are embedded in the GBA 's opening-up agenda and function as bridges and platform nodes across multiple domains. In the economic dimension , overseas Chinese investment and global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have optimized the structure of the GBA 's opening-up pattern and fostered innovation in business management modes. In the innovation dimension , high-skilled overseas Chinese professionals promote the agglomeration of frontier technologies and managerial know-how in the GBA through return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aspora knowledge networks. In the cultural dimension , overseas Chinese advance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Lingnan culture and facilitate mutual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 thereby enhancing the GBA 's international cultural influence.

This paper extends prior research in two main respects. First , by examining overseas Chinese-GBA interactions from an opening-up perspective , it helps to address the relative neglect of overseas Chinese in earlier GBA studies. Second , through a multi-dimensional mechanism analysis , it elucidates the functional roles and institutional significanc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China 's pursuit of high-standard opening-up , thereby enrich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and regional opening-up.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homeland development and offers policy-relevant insights for improving overseas Chinese-related governance in the GBA and for guiding overseas Chinese toward higher-quality participation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logical path; policy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 王辰月  
责任校对 张 鹏